

1911, 革命与宿命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著

汤因比般的深刻意念、唐德刚般的深邃思索
钱穆般的深远爬梳、黄仁宇般的深入考据
深度解析辛亥革命的宏大历史和微细场景

1911 革命与宿命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1911

革命与宿命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11, 革命与宿命 / 赫连勃勃大王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108-0791-6

I . ① 1… II . ①赫… III . ①辛亥革命—通俗读物
IV . ① K25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6706 号

1911, 革命与宿命

作 者 赫连勃勃大王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5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791-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革命与宿命 | 目录

· 上卷 · 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

引 子 火山口上的政权	2
第一章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	6
第二章 地方与中央的角力——立宪派与督抚们 在“民主”演练中的怨愤	24
第三章 那只“看得见”的大手 ——北洋军事势力的抽心一剑	50
第四章 离心离德的“长城” ——新军的政治逸轨	63
第五章 “受迫害狂”的臆想 ——民族主义心理的“裂变”	74
第六章 民间力量暗流涌动——会党势力及“邪教” 对清政权的侵蚀	85
第七章 铁路，辗过大清帝国的心脏 ——四川保路大起义的发酵	95

· 下 卷 · 革命进行时

引 子	早产的革命	114
第一章	暗夜沉沉血作灯 ——唐才常，新世纪率先倒下的英雄	118
第二章	赤血横流洗乾坤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的无悔青春	131
第三章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韶华时光汪精卫	153
第四章	一夫鸣枪 三军皆反 ——辛亥首义之精彩华章	173
第五章	多米诺骨牌这样倒塌 ——辛亥革命长镜头	210
第六章	坐看中原鹿正肥 ——袁世凯出山	239
第七章	短暂的共和 ——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	264
第八章	百劫山河乱愁叠——清朝的覆亡	283

· 附 卷 ·

附 一	启蒙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悲剧 ——从端方和赵尔丰谈起	304
附 二	国殇为鬼无新旧 ——从张振武看辛亥首义元勋们的下场	323
附 三	辛亥革命大事记	337

1911

革命与宿命

| 上卷

清朝覆亡的或然与必然

引子 火山口上的政权

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

在时任《泰晤士报》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的眼中，京城以及其他地方，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包含希望：

“在北京，我发现这个城市正在变样。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第家家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邮局每天投递八次信件。巡警简直叫人赞扬不尽，这是一支待遇优厚、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队伍……自来水供应良好，我敢断定，不需要多久，我们就能乘上电车……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再没有比这更使我深信不疑的了。你在全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兴修铁路正取得真正的进展……无论哪里修筑起一条铁路，那铁路穿过的省份就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好处。”（莫里循致伊迪丝·布雷克函）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

革命！

这种腾腾不息的、蠢蠢欲动的、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的、渐进的、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引爆的质变的过程。

龙旗之下，那些看似顺民的脑后拖着一根辫子的大清国子民，包括社会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对清政权都丧失了微小的期

待。即使统治阶级内部，地方以及中央的大多数成员，都对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心存贰意，他们怀着某种夹杂忧虑、幸灾乐祸、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甚至是企盼“那个时刻”的到来。

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人民对现实的普遍不满，由于困窘的生活，甚至打破了清末那种群体麻木的常态。

在北京，1911年的夏天，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摄政王载沣的团队踌躇满志：威权赫赫的袁世凯，已经被下旨回籍“养病”；革命党人的“三二九”广州起义被枪炮镇压下去，幸存的党人意气颓唐；第四次“国会请愿”烟消云散，立宪派灰溜溜回到各地的谘议局空发牢骚；军队中的“士官生”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新军各个层级“掺沙子”，虽然遭到北洋军人的顽强抵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挠——乍看上去，大清的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国内几乎没有能与摄政王集团相抗衡的政治势力。

但是，清朝，这个垂垂老矣的政权，腐朽已经发展到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华丽帝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菌群。

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清政府负屈忍辱，驾驶着这艘百孔千疮的“大清号”，战战兢兢地驶向莫知的未来。在维持每况愈下的勉强统治同时，西方列强，一手挽大炮，一手持“商品”，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割切。这些外洋强盗，细大不捐，巧取豪夺。被洋人们打得鼻青脸肿之余，清朝高层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怡然昏然，自我安慰地一直试图用“羁縻”（送钱送地）的方法对付这些东西“蛮夷”。屋漏偏遭连夜雨，突然而起的“太平天国”所造成的巨大内乱，最终使得老大帝国招来窝心一剑，捅得它气息奄奄。

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清政府陡然一变，上下同心，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然而，帝国的运气太坏。牝鸡司晨掌国纲，阴毒老迈的慈禧太后，不仅仅是帝国的政治符号，她还是真正的决策人物。而这位太后绣金凤袍的阴影下，看似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清朝一时的船坚炮利，皆成电光泡影。铁舰与钢炮未及使得洋务派们踌躇满志几天，甲午战争的巨大挫折，使得清廷上下饱满的希望，随着北洋舰队一起沉入冰冷的海水。

如此，“满大人”们再多的努力，也是徒劳！

悲恸之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高喊：“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强烈呼吁改革。但是政体改革，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手无寸柄的

光绪皇帝，书生气的维新大臣，赤手空拳想与老迈而阴奸的慈禧及其羽翼争斗，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固然谭嗣同临死一呼“我自横刀向天笑”，热血汨汨声中，更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惶。

再后，由于误信洋大人要逼迫自己还政于光绪帝的谣言，慈禧太后因一己之私，兴昏庸无智猖狂之计，唆使义和团排洋。阴暗的动机，仓促的行动，招致的是骇人的结果——八国联军的马蹄和炮火，不仅仅使得这位大脚太后仓皇逃离紫禁城，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洋人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进而使得清廷在民间的威信扫地无遗。

随之而来《辛丑条约》的签订，更使中国四亿国人要为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轻率唐突买单——近十万万两的巨额赔款，压得四万万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本来是四亿五千万两，因为清政府当时无力偿付，要分39年还清，申算为债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从1901年起，中国每年要摊付给列强二千八百余万两。）

国势日蹙之下，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风潮，至此蔓延各地。恰似御史叶芾棠的奏折所讲：“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勤，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想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

在如此社会背景下，革命，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不可止息。清朝年青的王公贵族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

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其实并非那个时代当然无二的必然选择。在清王朝最后惨淡经营的十年中，确实闪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君主立宪。这种政体的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出部分公民权力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能够抓住机会，清廷或许像日本那样，很有可能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保持住更广泛的历史连续性。

可惜的是，在清王朝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那几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数人只是粉饰涂抹，真戏假作。而且，清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巨大挫败，没

能激使本身变成有效力的民族化和政治化的政府，没能使老大帝国一蹴成为成熟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结果，满族高层在他们自身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的时候，国内人民心中却充满了轻蔑。

面对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十四项“君上大权”第一条内容：“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着这样的字样，观察着王公贵族们忙活终日的“结果”，换来的，仅仅是革命党人和普通民众这样的评价：一切都是拙劣的欺骗！

坐待，等来的只有革命。没等政治裱糊匠们和油漆工们在大清国旧机器上涂抹粉饰新的油彩，就在满大人们磨磨蹭蹭之际，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

革命看似成功，但是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新政权不可能扫清一切，不可能改变一切。看似天翻地覆的革命，其实是某种“修改”而已——“皇帝”，不过是变成了“总统”。最终，民国自身，无可奈何地又被纳入旧的统治形式中去。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远远逊于原本可以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

短跑的革命，换来的是马拉松式的内战和长期的混乱。

所有的权力运作者，包括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而那些错误，会激起巨大的涟漪，且导致新的后果，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荒诞的、让人惊诧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机会，激进的革命者也无视这种历史机会。政治革命很容易去“开创”，但难以对国内外的成功案例加以模仿。正因如此，翘首企盼的苦涩，将会在辛亥革命枪响后，长久萦绕于我们的心头。

第一章 被刻意夸大的鸿沟 ——倍然激化的满汉矛盾

创刊于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晚清那个时间段，对中国曾经进行了大篇幅报道。虽然其中不乏当时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偏见，但它也饶有兴趣地从美国人特有的视角，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和中国人进行了第一时间的感性化、真实化勾勒。其中，美国记者在 1876 年 2 月 20 日对国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象力。他们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们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

“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他们）实在不应该是这样啊！”

这段话最后的那句感慨，非常非常重要。

确实，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文化的汉民族，本来是个广富活力的、具有无限创造力的民族。一切的悲剧，都源自明朝覆亡的那一刻。

明朝一代，总体上讲，除了朱棣“靖难”篡位内战以及最后十几年内外交困大战的两个时期外，明朝二百多年间的对外武装冲突和境内离叛都不算严重，持续时间也不长。从“大局”上观察，明帝国社会大多时间段内，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之中。明朝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积极有效，对内政令推行顺利，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传统方面极具总结性。

但是，明帝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的大舞

台上观察，就难免显得逊色。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天文地理、历法运算等自然科学领域，大明王朝因中央帝国故步自封的意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球，是世界性的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当郑和的辉煌远航被当做浪费国帑而遭故意尘封之后，中国人的冒险意识和进取精神，逐渐为妄自尊大的心态和科举场屋的钻营所遮蔽。放纵享乐的低俗欲望，取代了原先勃勃拓展的高尚萌动。

成熟文明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与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且，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也仅仅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明朝的灭亡，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边缘没有坚持太久，突然袭来的内部崩坍和满洲少数民族外力，刹那间结束了明朝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

农民战争的巨大消耗与东北少数民族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终于把大明王朝在极短时间内推入了历史的鸿沟之中。一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终于沦为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屠龙骑士们最终用刀剑刻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大明帝国灭亡前，连一个让人喘息的回光返照时期都未曾享受过，但它也没有经历过五代十国那样长久的“末世”期。清朝统治者汲取了蒙古统治者的失败教训，在短暂而骇人的恫吓之后，他们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开始了庞大帝国处心积虑的经营。可悲的是，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并未被移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清朝那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使中原王朝迈上了一种看似辉煌其实原地踏步的停滞之途。古老的中华文明，并未在改朝换代和“异质文化”浸染下得以类似两晋五胡时代的凤凰涅槃，而是陷于一种清朝统治者有计划、有目的精神圈围的窒息氛围之中。

清朝统治者这种“柔性”的、极具权术手段的精神摧残，表面上看似粘合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理与文化间的裂痕，究其实，于汉民族而言，这种处心积虑的摧灭和压抑，对中华核心价值的腐蚀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衰退的可怕性，甚至超过无数个“扬州十日”。

万马齐喑中，在无尽的统治高压之下，我们汉民族性格同趋而下，日益变得消沉、靡顿和繁琐。昔日天真率直、奋发有为、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日益成为柔懦和忍耐的“顺民”。

明王朝丧钟响起之后,中国在“满洲化”的适应过程中,其实步入了一种浑噩而长久的假寐期。令人泫然悲哀的是,明亡之后,经过这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继之而来的,是命中注定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而后,就是西方“文明”蛮族的野蛮侵略。到十九世纪中晚期,昔日威名赫赫的中央帝国臣民,在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夷士兵眼中,竟成了荒诞可笑的脑后拖着猪尾巴小辫的“土著”。

可悲的是,当清朝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时光又过了快一个世纪,我们国人心中的“辫子”,仍然顽固地悬浮在脑后……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对于公平与分配政策有着深刻、清晰的见解。他认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肯定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随着社会中的人群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的普及和日益明确,人们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会更加迫切地进行比较且得出更加令人反感的、难以忍受的结论,也就是说,“人们受的苦可能减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却提高了,这种现象,现在通称为‘托克维尔效应’”。

什么是“托克维尔效应”呢?

作为《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巨著的作者,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对“革命”有着他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表述。他认为,革命的起因,并不在于一个国家人民的长期贫困,反而是发生在他们的生活条件随着经济增长获得大幅度改善之后。法国就是一个鲜活的例证,大革命发生前,法国社会那种史无前例的、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反而最终引起了民众一种普遍的不安定情绪。因为,人民的满足感,主要源于他们对社会未来福利水平的预期。

所以,托克维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一个残酷政权的桎梏紧紧束缚时,人民对自由的憧憬非常渺茫;但一俟这种桎梏产生松脱,大众会忽然对于自己身上的残存枷锁过分敏感,就会觉得它们根本无法忍受!

根据我们常人有限的“常识”,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经济增长和政治开明是件好事,因为这两种因素可以提高一个社会人群的满意程度,使得社会日趋安定。由此推之,贫困和专制,长久以往,一定引发社会动荡和暴力事件。

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酷的事实往往与简单美好的推断背道而驰。美国历史研究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总结道:在英国统治时

期的印度，政治暴力冲突频发的地点不是穷困地区，而是普遍发生在那些经济发达的省邦；数据和历史事实也表明，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前，恰恰是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的不满情绪反而最激烈。

这种历史的吊诡，在清末的满汉民族矛盾中，也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

沉甸甸的历史回忆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一份署名“铁郎”的《论各省宜速响应革命军》文章中，有如下极具煽动性的文字：

“满清觉罗之入关也，屠杀我人民，淫掠我妇女，食践我毛土，断送我江山，变易我服色，驻防我行动，监督我文字，括削我财产，干涉我言权，惨杀我志士，谬定我宪法，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我国民虽包容彼族，其如日日防我家贼何！我四万万之民族日益削，彼五百万之膻种日益横……夫中国者，中国之中国，非满洲之中国也！”

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反满、排满意识，已经风生水起，一发不可遏制。拒俄运动中，人在上海租界的张继，就已经发出过如下论述：

“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为满洲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

署名“怀曩”的革命者在《复报》第五期如此说：“彼诸申贱族，人口不过五百万有奇耳，无文化，无学术，无道德，无思想。当其未入关以前，榛榛狉狉，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与深山之猺獞奚择。彼种之沉灭，曾何足重轻。而吾汉族，则固煌煌然四百兆华胄也，户口百倍，文化万倍，历史之价值，民族之荣光，更高不知其几千万级……”

与此论相呼应，革命大腕章太炎说得更明白：“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由此，戊戌变法后的“忠君”意念，一变而成为旨在革命的排满风潮。

也就是说，在历史记忆沉淀中，当时真实的满汉关系完全失去了粉饰多年的温情脉脉，满族人群成为众恶所归，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早已经扔入历史深洞中的词语，重新被捡拾出来——“犬羊”、“东胡”、“逆胡”、“膻虏”、“建虏”、

“索虏”、“鞑虏”等等，沉渣泛起，鸦片战争后被满汉士大夫专指西洋列强的“夷虏”字眼，忽然间都堆砌在满人统治者身上……

其实，满汉矛盾，从始至终，一直是清朝统治者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

清朝乃马上立国，女真基因的满洲军事集团横暴异常，他们靠枪靠马靠杀人建立起强权政治。这些从山海关外奔驰呼啸而来的“野蛮人”，开国之初，他们就创设了不少民族歧视政策，且一直延续下来，一直到清末。

第一，官职分满汉。同职官称，满官大于汉官。重要衔职，汉人不能染指；第二，对待满汉采取不同的法律。满汉发生纠纷，偏向满人；第三，满汉不准通婚（不准旗女嫁汉人，默认汉女嫁旗人）；第四，满人不从事生产，只可作职业军人，他们的生活，全由政府包办。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民族歧视政策，自清初到清中叶，由于清王朝的军事压力强大，“盛世”呼声高，国内的所有满汉人民，似乎对这些“不公正”皆习以为常，没多少人跳出来“重视”这个问题。

其实，在清朝统治的所有时间段，反满和排满一直没有停止过。朝堂之上，清朝确实有着不少汉人的高级合作者：陈名夏，李光地，汤斌，徐乾学，高士奇等等；但在民间，一直以“夷夏之防”为主张的知识分子，与那些“顺臣”相比，更是不绝如缕，薪火相传。在他们“春秋大义”的感召下，民间各种武装结社和会党活动非常活跃，仇满排满的思潮暗流涌动，与清朝相始终，从来没有停歇过，其中尤以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最为直接明白。

为了针锋相对，清朝大兴“文字狱”。在扑灭反满宣传的同时，他们对各种会党反抗也不遗余力予以残酷镇压。以文字狱为例，清政府从顺治五年（1648）的毛重倬的“刻制艺序案”开始，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贺世盛“笃国策案”为止，大狱繁兴，多达八十多起，牵连人众，穷究极治。

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清廷才稍稍放缓文字狱的究治。随着文字狱的放松，知识分子参与的会党活动也趋于低潮，其标志是嘉庆年间江西的胡秉耀等人率朱毛俚起事的最终失败。在狱中，胡秉耀曾给江西巡抚阮元写了几首诗，可以发现中国反满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能解春秋有几人，漫将刘备作黄巾。”

树欲静而风不止。没过多久，白莲教暴动开始了新一轮排满反清的历程，而鸦片战争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檄文满天飞——“胡奴”、“鞑狗”字眼遍

布人目，特别是杨秀清的《奉天讨胡檄》，脍炙人口之余，一泻二百多年汉人的沉郁悲怆之气。即便如此，由于白莲教、太平天国政治视野狭窄，他们反满色彩并非十分浓厚，且再不提及“反清复明”的古老口号。

清末十年间，满汉矛盾愈演愈烈，甚至达到太平天国起事以来的最高点。革命党人煽动起义，最叫人们热血沸腾的，就是拿满汉矛盾当大题目来加以发挥。

如果仔细翻检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通篇累牍，赫然入目最多的两个字，就是“排满”！无论是兴中会誓词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四字，皆明晃晃列为首项，耀人眼目。

值得我们叹息沉吟的，作为近三百年来政治支配者的满族人群，在儒家文化具有超强同化“腐蚀力”的中国，竟然一直“融而未化”，确实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满人入关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逐渐成为满族自身的文化传统。这种转变，非常非常充分，因为中国文化那种绝对的、不可抗拒的魅力，任哪个草原民族都无法抵御。而作为一个种族的满洲人群，它的历史性格，不是人种、族群那样简单，更重要的是他们文化内心的演变过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满族真正“民族意识”自觉的形成，不是辽地铁马彻地来的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而是“排满运动”如火如荼的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

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满洲并没有鲜明的民族文化认同。1635年，皇太极改“诸申”（女真）为“满洲”，只是模糊地表达了一个新兴政权合法性的意念，因为“女真”这一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后金统治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出于简单的“汉化”理论，学者们往往从汉文典籍中梳理这样一个脉络——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其实，上述词语的历史连续性很值得商榷。

八旗制度是维系初期后金（清）的一个根本基础，它先于“满洲”的概念存在。这个军事集团中，不仅包括女真人，还包括汉人和蒙古人。不仅八旗满洲中有大量的汉人和蒙古人，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中也包括满洲人。可见，当时的后金（清）是个没有共同文化传承和血缘关系的军事共同体。

我们知道，统治中国这样一个广袤的国家，不只是民族意义上的统治，不可或缺的更是文化上的统治。所以，作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清朝从汉人那里汲取了儒家的治世经验和官僚统治技能，从藏人那里得到了“佛”的超自然权力，

从蒙古人那里承继了“黄金帝国”的世袭，从八旗满洲获取了具有高度适应性的军事驾驭能力，并且从周遭的安南、朝鲜、琉球等小国那里获取了“中央帝国”的宗主权力。

有了上述种种权力和能力，满洲自然具有了种族认同的优越感。但是，满洲在意识形态上的构建，开始于乾隆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乾隆这个最具满洲统治意识心态的皇帝，在清朝中后期却在汉人自欺欺人的笔记和传奇中被描述为是汉人的血胤（即使在金庸笔下，他的武侠小说也没有忘却这种“童话”）。

民族和种族的构建，它的驱动力是统治者的政治、文化以及心理需要。在甲申年血腥入关后，作为军事征服者的满洲人进入了汉人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散居各地的“驻防”行动，阻隔了满洲人的联系，不仅宗教、语言的纽带松脱，他们的生活和文化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几十年，八旗勇悍的共同人格已经消失殆尽，以至于到了吴三桂叛乱的年代，清朝所依靠的武装力量，已经不再是他们入关的先辈所倚恃的八旗军，而是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军。不仅如此，他们赖以炫耀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身份，也逐渐黯淡下来。

有鉴于此，处心积虑的乾隆帝开始了大清帝国的基础加固工程。为了加强满洲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认同，他从纂修满洲世谱入手，竭力推动文臣们钩沉早期女真在东北的发展史，大修八旗宗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对满洲追溯溯源，从血统方面强化满汉的差别，特别要把“首崇满洲”的理念进一步深化，以证明满洲族群卓尔不群的独特和尊贵。

乾隆帝这种努力，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忧患——在中国这样一个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维护高度集权化的帝制，必须依赖一种强有力的权力表述系统，必须强调统治人群（满洲）的血统高贵和独一无二的特性，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的各项基本因素。

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它肯定已经发生了。

大清皇帝这种行动说明，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他已经感到了满洲文化的式微，所以才亡羊补牢式地对族群开始一种追述回忆般的叙述构建。

满洲作为统治阶层，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并未把汉人对他们的文化同化看成是一场噩梦。但他们民族身份的内心复活，却在晚清压力下突然变得鲜明起来。

这种对满洲族群身份认同的忧虑，早在皇太极时代，其实已经开始。遥想